

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(第二辑)

总主编/李玉明

慧法 远显 南西 下行 传取 教经

三晋大地上
那一座座金碧辉
煌的寺庙大殿，
展现了山西佛教
文化的韵味，而
这本小册子则要
告诉你先于唐僧
取经的山西高僧
法显和印度佛教
中国化的开创者
——慧远的生平
事迹。

林 芳 高 良 秀 王 建 华
/ 著 / 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复审:甘戈

终审:杭海路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法显西行取经·慧远南下传教/王建华等著. —太原:

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01. 3

(山西历史文化丛书·第2辑/李玉明主编)

ISBN 7-203-04188-3

I. 法… II. 王… III. ①法显(约337~约442)

评传②慧远(334~416)—评传 IV. B949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5418 号

法显西行取经·慧远南下传教

(山西历史文化丛书·第2辑)

王建华等 著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-4922102

<http://www.sxep.com.cn> E-mail: sxep@sx.cei.gov.cn

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5.25 字数: 302千字

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3000(套)

*

ISBN 7-203-04188-3
K·204 定价: 30.00元(套)

《山西历史文化丛书》编委会

顾问：王 谦 李立功 王庭栋 马 烽

姚奠中 侯伍杰

主任委员：赵雨亭

副主任委员：李玉明

委员：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马玉山 马志超 王志超 王宝库

王灵善 牛崇辉 申维辰 白云

任茂棠 刘 江 刘 巩 刘在文

刘伟毅 刘贯文 成葆德 齐荣晋

李元庆 陈扬炯 陈墨章 张 领

张国祥 张捷夫 罗广德 赵劲夫

赵瑞民 赵曙光 高专诚 高培湖

陶正刚 柴泽俊 阎广洪 梁豫秦

谢洪涛 楚 刃 雷忠勤

目 录

一、少年游学行万里 弘扬佛法上庐山	(1)
二、中外名僧聚东林 名士达官居士群	(5)
三、大乘小乘融一炉 儒道入佛创新论	(14)
四、印度佛教中国化 三教合一建伟业	(21)

引子

东晋后期，中国有两个佛教中心，一个在长安，以西域僧人鸠摩罗什为首，以译经为主；另一个在庐山，以慧远为首，除译经传法之外，还致力于使佛教符合中国国情，创建中国佛教。慧远所遗留的著作、思想，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都有深远的影响。

一、少年游学行万里 弘扬佛法上庐山

慧远（334—416年），本姓贾，东晋雁门楼烦（今山西省原平县崞阳镇东）人。慧远出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。当时，社会等级森严，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”，上流社会享有优越政治、经济特权，慧远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可以保证他有条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。

慧远幼年、少年时期，主要学习儒家经典，对于当时流行的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，他更为精通。13岁时，他不满足于私塾中的学习，跟随舅父令孤氏游学于河南等地，访问当时有名的学者，游历名山大川，观察民风民情。这段游学求师大约有5年之久。21岁时，他特别仰慕江东大学者范宣子，准备带着弟弟慧持“渡江东”，从范宣子求学，但

为战争阻断，道路不通，未能如愿。分析起来，这时慧远的志向大约还是传统的做学问与做官，因为范宣子的主要学问是“精通三礼”，他的学生大部分是做官的。后来，著名的佛学大师释道安在太行恒山（今河北省曲阳县北）立寺传播佛教，名声很大。慧远、慧持到了那里，听了道安大师的讲经说法，十分敬佩，惊叹说：“真吾师也。”认为以前十分喜爱的儒道九流“皆糠粃耳”，毅然与其弟削发，出家于道安门下。

慧远的这次重大转折，很有点“顿悟”的味道，但这种顿悟决不是无源之水。慧远“顿悟”信佛，既有深刻的社会背景，也有他个人特殊的追求。

慧远所生活的时代，基本与东晋王朝相始终。其时南北长期分裂，军阀混战，民族冲突，战争频繁，人民要求安定的生活环境的愿望不能实现，士大夫阶层也由于内部倾轧的残酷，人人自危。现实生活的艰难处境，使人们深感生命短促，人生无常，迫切希望解脱苦难。许多儒士或者隐居，或者转而钻研道家学问。但道家提出的长生不死，羽化成仙，只是梦幻，没有现实的参照对象，因为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神仙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，佛教因果报应的出世思想，为人们指出了一条可以“获救”的道路，即今世学佛做善事，来世就有好报应。因此，在北方，由于西域僧人佛图澄的大力弘扬，中下层大批人士在很短时间内就信奉了佛教。南方的知识层中，也涌现了大批佛门信徒，他们做了不出家的和尚，被人们称为“居士”。这种背景，正是慧远皈依佛门的外在原因。从内在原因来讲，聪

明颖悟的慧远，在他追求的思维空间中，佛经般若学说比道家的学说要更精致，更能从思维的深层打动他，这大概便是他顿悟的原因。

慧远晚年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，少年的游历与学习，主要是醉心于儒家经典，后来接触到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等道家经典，才明白原来所学的东西不过是些应酬人际关系的“虚谈”。学了道安的佛学后，才知道了生死的大道理和世界的本质。这段话真实地描绘出他由儒入道，既而皈依佛教的道路。

慧远皈依佛门之后，“常欲总摄纲维，以大法为己任”，雄心勃勃，要建立佛教法规宏纲。为达此目的，他“精思讽持，以夜继昼”，刻苦钻研佛理。由于他基础雄厚，思路敏捷，佛学理论素养日趋成熟，佛学造诣日臻精湛，仅三年就成为道安门下的上首弟子。24岁时，他便可以开讲佛经。一次在讲般若经时，听众对“实相”之义（佛教认为世界的本质是“空”，现实世界是“假”）感到不解，提出质疑。慧远先用佛经的道理反复讲解，结果疑义越来越多。他大胆打破当时讲经不用“俗曲”的戒条，而用《庄子》“梦为蝴蝶”的故事进行比喻，于是“感者晓然”，大家都明白了。这次成功的讲解，使道安特许慧远可以引用佛典之外的书籍来说明佛理。这次尝试，对于慧远乃至中国佛学，意义都是不寻常的，它是融合儒、佛、道的第一次尝试，从此奠定了慧远的努力方向。道安对于慧远的创造性，深感欣慰，曾说：“使道流东国，其在远乎！”认为能使佛教大道流行于中国的，一定非慧远莫属。道安慧眼识人，慧

远也没有辜负道安的期望。

慧远 31 岁时（356 年，东晋兴宁三年），由于燕军进占河北一带，战乱使得他无法继续讲经，便跟随道安去了襄阳。公元 380 年，由于前秦进攻，道安被迫分散徒众往各地传教。临别前，道安对弟子一一海勉，惟独对慧远这个追随他 25 年之久的上首弟子不发一言。慧远跪求道安给自己一点教导，道安说：“如汝者，岂复相忧？”即像你这样的人，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。从此师徒分手，道安北上传教。

慧远厌恶离乱，本想远远离开中原，到广东罗浮山结庐，栖身传教，但在路过浔阳（今江西九江）时，“见庐峰清静，足以息心”，就在幽静秀丽的庐峰定居下来。当时慧远已 47 岁。初到庐山，慧远的同门好友慧永为他在西林寺旁建立了龙泉精舍，居住修道。三年后，由于慧远广传佛教，来者日多。龙泉精舍地方狭窄，江州刺史桓伊平素就慕慧远风范，于其便在西林寺东面为慧远建立了东林寺。东林寺四面环山，南面正对李白所吟“日照香炉生紫烟”的香炉峰，门临清沔的虎溪，山水秀美，林木茂盛，环境十分幽静。

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主持佛事 30 余年，至死没有出山一步，这是他的佛教事业最活跃的时期。在这一时期，他在庐山聚徒讲学，撰写文章，培养弟子，邀集西来经师译经，和上层统治者相交往，展开了多方面的宗教活动，逐步形成了一个庐山僧团和听法修行的居士团体，使庐山成为南方的佛教中心。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（416 年），慧远圆寂于庐山东林寺，终年 83 岁。

二、中外名僧聚东林 名士达官居士群

1. 著书立说

慧远出家之前，就是一个饱学儒生，跟随道安 25 年，系统地研究了佛理，对般若学更为精通，在庐山又跟从僧伽提婆学毗昙，跟从佛陀跋陀罗习禅法，与鸠摩罗什书信往返讨论大乘中观学。在学问上他是佛、儒、道兼通，学派上他是大、小乘并蓄，最终形成自己以佛教为核心，广泛吸收百家学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。

慧远的著作很多，《高僧传》载：“所著论、序、铭、赞、诗、书、集为十卷。”但这些著作多已散佚，一部分散见于《出三藏记集》、《高僧传》、《弘明集》、《广弘明集》、《庐山记》、《释文记》等书中。清人严可均所集《全晋文》中，保存有不少篇目。1935 年，苏州弘化书社曾出版《庐山慧远法师文钞》一册，其中收录了慧远遗文 38 篇。

慧远的著作基本上分为两大类，一类是有关佛教理论的，旨在充实、改革佛学；另一类是宣传佛法的，以扩大影响。

东晋时佛经传入的种类远不如唐代齐全，翻译的质量也差。慧远在组织翻译佛经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。在他的著作中，保存有许多翻译经文后所写的《序》，像《阿毗昙心序》、《三法度论序》、《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序》等。这些《序》除了说明由谁翻译外，还指出所译经文的要旨及

翻译的特点，饱含着慧远对佛学的识见。慧远组织翻译佛经，既丰富了中国佛学宝库，也推动了佛学的研究和传播。比如，《阿毗昙心论》这部著作属小乘部，内容十分丰富，是佛教小乘学说的纲要，但当时并没有一个好的译本。公元391年，慧远请毗昙大师僧迦提婆上庐山翻译。因这部著作的梵文版本是以韵律体裁表达的，翻译难度很大，提婆一边翻译，一边讲解，然后又用汉语韵律表达出来，四卷书译了近一年，慧远又作了校正。这部经后来发展成《俱舍论》，世人又称为“聪明论”，它推动了毗昙学的研究，促进了小乘佛法的推广。

僧迦提婆在庐山还翻译了《三法度论》，其要旨重在践行辨别是非，是初学佛教者的阶梯。慧远也为这部重要的佛教著作作了《序》。禅法是佛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但当时禅法著作翻译的很少，质量较差，且缺乏系统性。公元410年，慧远不顾门派之争，把被鸠摩罗什驱逐的禅师佛陀跋陀罗从长安请至庐山，用了一年时间译出《达摩多罗禅经》（即《修行方便禅经》）二卷，介绍了高僧达摩多罗佛大光的禅法。慧远为之作序，认为这部禅法弥补了鸠摩罗什未把禅法说透的不足。禅法的要点是修行，其主要内容是：一、戒迷惑于女色，杜塞六根以平息祸患。这是指修“不净观”；二、戒忿怒竞争情绪，忘却人我，一视同仁。这是指修“慈悲观”；三、人身为“四大”（地、水、风、火）一气化成，不必执于我见。这是指修“界分别观”；四、理解生死本质为十二缘起。这是指修“因缘观”。做到这些，就可以逐步取得罗汉正果。禅法经慧远提倡，对后来中国

佛学的影响很大，如后来慧可等所传达磨禅法，就使用了这种说法。

慧远一方面请名僧翻译经典，另一方面又根据流传的需要，对佛教典籍加以删削加工。比如《大智论》经长达100卷，慧远认为太“繁秽”，删削为20卷的《大智论钞》，并为之作序。这种删削加工，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，体现了慧远对佛学理论的认识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慧远对翻译理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，他提出翻译的原则是：“音不曲尽，文不害义，依实去华，务存其本。”即不拘泥于语音，少用音译，多用义译，译文不能损害本义，去除华而不实，保留原文的根本意义。这个原则非常接近近代翻译要“信、达、实”的标准，但较其早一千多年。

为了更适合中国人学习佛法，慧远晚年亲自撰写佛学著作《法性论》，讨论了法性的本质，法性与物质世界的关系，法性的常存不变等问题。这些观点与佛教原来的教义已有很大差别，是慧远融进中国传统思想后的新创造，因此其价值极高。

慧远现存的著作中，宣传佛法，回答世俗社会对佛教的挑战的理论文章也占有很大比重，如《沙门不敬王者论》、《沙门袒服论》、《三报论》、《明报应论》等。沙门该不该礼敬帝王，这是礼教与佛教的较量。早在东晋成康时，就为此发生过论战，当时佛教徒虽然取得了胜利，但在理论上并没有过关，因此50多年后，朝中重臣桓玄又提出了这个问题，作为佛教领袖的慧远积极参与了这场论战，他

写了《答桓太尉书》、《沙门不敬王者论》等文章。既阐明了沙门的独立性，区别了佛教在家与出家的关系，又委婉地解释了佛教与世俗礼教对于教化的一致性，成功地回应了这场论战，从理论上保证了佛教在中国的合法地位。《沙门袒服论》是论说和回答世俗对沙门礼义的责难。《三报论》、《明报应论》等，是从佛教立场上向世俗世界灌输因果轮回报应思想。对“神灭与不灭”、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”等问题，以佛教理论为核心，运用大量的儒道经典给予论证说明，富有浓郁的中国气息，表现出慧远融合佛儒道三家的高超能力，慧远的这些文章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初步奠定了中国佛学的基本准则。

慧远还有许多铭、赞、颂等文章传世。文笔与境界均富有特色。还有相当一部分书信，反映了慧远与上层统治阶级、佛教界人士的密切联系，有极高的史料价值。

2. 建立庐山僧团

培养组织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庐山僧团和居士群体，是慧远佛门生涯的又一项主要活动。

庐山僧团的主要人物是慧远的同门好友慧永和胞弟慧持，还有其众多的弟子。

慧永（332—414年），东晋高僧，俗姓潘，河内（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）人。早年出家，后投于道安门下，与慧远交往很好，曾相约一起去罗浮山结庐传道。后东晋光禄勋陶范留他住在庐山，并为他建立西林寺。他是庐山僧团的创始人之一。在修行方面，他谨守戒律，信奉弥陀西

方净土，并培养了众多弟子。

慧持（337—412年），慧远胞弟，18岁时与慧远同为道安弟子，后又与慧远同至庐山，是慧远的得力助手。慧持学问精深，曾为僧迦提婆所译的《中阿含经》校订文稿，为豫章太守范宁讲解《法华经》、《毗昙》等佛教经典。399年他辞别慧远西行入蜀，在龙渊精舍修行。在四川，诸僧“皆望风推服”，把能入其门为弟子称为“登龙门”。不久又转住涪县中寺。琅琊王王恂曾问范宁：“远、持二公谁更优秀？”范宁回答说：“诚为贤兄贤弟也。”

史载慧远的弟子约100余人，比较著名的有30多人，如僧济，东晋太元年间入慧远门下，对佛教大小乘诸经及儒家经典都相当熟悉，其学习方法深得慧远真传。又如道祖，先为台寺法齐弟子，后至庐山师事慧远，曾著有《魏世经录目》、《吴世经录目》、《晋世杂录》、《河西经录目》。后离庐山到建康瓦官寺讲经，大将军桓玄常去听讲，认为道祖的佛学造诣很高，甚至超出慧远，但儒学不及慧远广博。又如昙邕，少壮时曾为前秦的卫将军，淝水之战后从道安出家，后又师事慧远，对“内外经典，多所综涉”。他是慧远与鸠摩罗什的信使。

再如法安，是慧远的一个善于理财的弟子，兼习禅业，其信徒甚众。慧要，善制作，曾造漏刻、飞鸢等，自然科学知识十分丰富。此外还有僧彻、僧翼、昙诜、道朏，都是当时的名僧。

纵观慧远的这个庐山僧团，人才济济，既有在佛学各个领域颇有造诣者，也有在社会活动、品德修行等方面佼

佼出众者，他们继承、传播了慧远的思想，同时也是慧远佛学事业成功的一个显著表现。

聚集在庐山僧团周围的居士群体，其社会影响要更大一些。庐山僧团中的慧远弟子，大多出身寒微，其影响也主要是在佛教界内部；而这个居士群体，大多数是社会名流，属上层统治阶层，故其影响更为巨大。据史载，这个居士群体的著名人物有刘遗民、雷次宗、宗炳、周续之、张野等人。

刘遗民（352—410年），原名程之，字仲思，彭城人。自幼读百家书，尤好佛理，曾任柴桑县令，后隐于庐山，著有《释心无义》。他与慧远交往很深，二人曾共同“披寻玩味”僧肇的《般若无知论》。慧远劝其修念佛三昧，他深信不疑。元兴元年（402年），由慧远发起，共有123人在“精舍无量寿前，建斋起誓，发愿西方”，这个誓文即由刘遗民所撰。

雷次宗（368—448年），字仲林，南昌人。他早年进入庐山学佛，拜慧远为师，笃志好学，对儒家经典如《三礼》、《毛诗》等尤为精通。慧远讲《丧服经》时，他与宗炳等“并执卷承旨”，洗耳恭听。著有《略注丧服经传》一卷。

宗炳（375—443年），字少文，南阳人，擅长弹琴书法，精通玄学佛理，曾被东晋大臣殷仲堪、桓玄等人举荐为官，是慧远与上层社会结交的重要中介人物。著有《明佛论》，论证神不灭和三教合一，其学说深受慧远影响。

周续之（317—423年），字道祖，雁门人，通晓五经五

纬，时号“十经童子”，对《老子》、《易经》等也深有研究，与刘遗民、陶渊明并称为“浔阳三隐”。后曾被宋武帝征召至京，讲授《礼经》，闻名京师。周续之曾师事慧远，对慧远十分钦佩。他与当时著名学者戴逵曾就因果报应问题进行论辩，慧远就他们的论争写了《三报论》，对佛教善恶报应思想从理论上作了阐述。周续之与慧远相处时间较长，二人的思想互相影响也较大。

张野（350—418年），字莱民，南阳人，与陶渊明有姻亲关系，史载他“学兼华梵，善属文”。他曾被朝廷任命为散骑常侍，却不肯赴任，在把家产田地让给兄弟后，入庐山师事慧远，修弥陀净土。

此外，较有名的俗家弟子还有张诠、王乔之等人，他们大多数是跟从慧远修行西方净土法门。

慧远周围的这个居士群体，是慧远与世俗世界联系的纽带。慧远从这个团体了解整个社会的宗教心理，又通过他们去弘扬佛法。通过这个群体，既能沟通上层统治阶级，又在形式上不会引起人们对僧侣奔走官府的恶厌心理，这也是慧远佛教活动成功的原因之一。

3. 与上层统治者的交往

《高僧传》说自慧远到庐峰30余年，影不出山，迹不入俗，每当客人来访，他送客的界限是东林寺门前的虎溪小桥。据说有次陶渊明、陆静修来庐山看望慧远，三个人谈得非常投机，直到分手时，还在不停地争论，就这样不知不觉中已过了溪边小桥。他们忽然想到慧远多年的规矩，

不禁哈哈大笑。这一“虎溪三笑”的传说大概是仅有的破戒。

慧远虽远居山林，但并没有绝离尘世。东晋时，庐山为江州所管辖。历任江州刺史，不管其政治态度或宗教信仰如何，都与慧远交往非常密切。慧远刚上山时，时任江州地方官的桓伊就资助建筑东林寺，后来又成为庐山僧团的直接保护人。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任江州刺史时，虽然信奉道教天师道，但也与慧远所交甚厚，曾大力资助过他。桓玄兼任江州刺史，虽持强烈反佛态度，却与慧远交往尤深。以后的历任继任者，都与慧远主动交往，给予资助。这使庐山一直有一个良好的修行环境。

但这种小范围的安定，并不是慧远的最终目标。慧远“以大法为己任”，要使佛教在中国深深扎根，这就需要在最高层次上取得统治者的理解和支持，从而打开弘扬佛法之路。

殷仲堪是东晋高级军事行政长官，太元十七年（392年），都督荆、益、梁三州军事，出任荆州刺史。在赴任途中，曾上山拜会慧远，共同讨论《易》理问题，他十分钦佩慧远的学问人品，说他见识深刻，明白事理，让人信服，世人很难与其相比。此后他曾给东林寺以大力支持。

桓玄（369—404年），桓温之子，袭爵南郡公，是晋室重臣。他征讨政敌殷仲堪，夺得荆州，权倾一时。在行军途经庐山时，派人请慧远出虎溪相见，慧远借故称疾不出，他便亲自登山拜访。二人一见，便争辩起来。他问慧远：“不敢毁伤，何以翦削？”慧远答：“立身行道。”桓玄一听，

顿生敬意。因为桓玄是以《孝经》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”来责难沙门削发是违背伦理，而慧远所答也是《孝经》上的原话，即“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孝之终也”，说自己是奉行孝道的最终原则。一语即折服了雄心勃勃、目空天下的桓玄。出山时桓玄对左右评价慧远说：“实乃平生所未见！”后来桓玄以震主之威，致书慧远，劝他还俗做官，慧远回书坚辞不就。公元402年，桓玄破建康，自称太尉，专擅朝政，下令沙汰（清理、整肃）僧尼。为此事他特地致书慧远，征求意见，慧远写了《与桓太尉论料简沙门书》，提出自己的看法。他的意见被桓玄基本采纳，并在沙汰命中特别指出：“惟庐山道德所居，不在搜简之列。”此后不久，桓玄又下令让“入座”（高级官吏）讨论“沙门礼敬王者”事，并请慧远发表意见。桓玄被说服，特诏许沙门不敬王者，即不对帝王行跪拜之礼。慧远与桓玄的关系，一直在争辩之中加深，二人的争辩，在历史上有极大影响。

后来，何无忌击败桓玄，迎晋安帝返回建康。何无忌与慧远也是老朋友，他劝慧远迎接安帝，慧远亦借故称疾不行，晋安帝在何无忌的鼓动下，遣使上山慰问，又下诏书致意，给了慧远极高的礼遇。

何无忌是被农民起义军首领卢循杀死的。卢循是慧远的世交，慧远不忌讳卢循“贼”的身分，曾与卢畅叙旧情。慧远以超然出世的态度，周旋于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双方之间，并赢得双方的尊重，这正是慧远高明的政治活动方式。

除以上人物外，慧远与东晋大臣王谧、著名文学家谢